

翻开常见的任何一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在叙述三代文明之前，照例首先是「北京猿人」，这迫使人们接受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裔。然而这是一种「推论溢出发现」的盲导，准确的说法是：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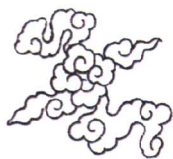
汉语起源 与 演化模式研究

李葆嘉 著

东亚大陆人类考古学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30万年生活在今称为北京的一带，仅此而已。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是「文起羲炎」，依据文献传说可以「稽古羲黄」，也许考古挖掘永远不可能发现像

商代甲古文那样证据确凿的伏羲炎黄的文化遗存，但是仍然无法否定华夏民族心理认同的历史开端。即使在「疑古时代」，除了极个别历史学家认为三黄五帝是子虚乌有，荒唐地把大禹「考释」成一

◆ 语言研究新思维 ◆ 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汉语起源与
演化模式研究

李葆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李葆嘉编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戴昭铭主编)

ISBN 7-5316-3797-9

I. 汉… II. 李… III. 汉语史—研究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137 号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

HANYU QIYUAN YU YANHUA MOSHI YANJIU

李葆嘉 著

丛书责任编辑:杨雪松 徐德林 张天栋 李 彤

张玉娟 王爱琳 张佳莉 张玉红

技术编辑:王秀艳 付 辉

封面设计:张建设 伊延波

责任校对:耿 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5·字数 355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3797-9/H·35 定价:24.00 元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顾 问：季美林 裘锡圭

名誉主编：胡裕树 吕冀平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晓 明 李 先 耕 李 彤

吴 国 忠 邹 韶 华 戴 昭 铭

主 编：戴昭铭

总 序

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推动了学术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语言学科也不例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知识最重要的负载形式和传播手段,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技术科学(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语言研究的新进展得力于知识更新。语言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思潮、新理论、新流派、新方法刷新了汉语研究的传统观念。拓宽了汉语研究的固有领域,促进了新一代学人的成长,推动了一批批新成果的成熟。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成果,我们编成了这套《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学术研究最忌陈陈相因,本丛书的特点突出一个“新”字。但是,求新并不是标新立异。本丛书在求新的同时,力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新思维”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含义:1. 新观念。指对传统研究课题通过刷新理论或变换角度进行研究而获得的新认

识。2. 新领域。指把汉语研究同其他人文学科或技术学科的研究相结合,通过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而扩大的语言研究领域。3. 新材料。包括对新发掘的历史资料或新搜集的语言事实整理研究的成果。4. 新方法。指对有同国际语言学接轨意义的研究方法的尝试使用。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在总体上具有实而不平、新而不奇的特色,而对各分册则要求能自成一家言,至于分册之间在流派和方法上不强求一致。

我们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读了各自需要的任何一分册后都有所收获,不致失望。但效果究竟如何,尚需实践检验。限于水平,疏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不吝赐正。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编委会

2001年6月

混成与推移： 中国语言的宏观研究(自序)

东亚华夏,为拥有 5000 年乃至 7000 年文明史的古老之邦。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考古文化系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随着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汉语的起源”或“汉语的祖先”这一挡不住的诱惑再次成为海内外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

从 80 年代中期起,我开始接触历史语言学。1985 年夏,在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汉语音韵学和藏语研讨班,有幸聆听民族语言学家周耀文、戴庆厦、倪大白和方言音韵学家郑张尚芳诸先生的讲授,并购得《汉藏语言概论》等书。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P. K. Benedict)40 年代提出、80 年代才为中国大陆语言学家广泛知晓的“澳泰语系假说”,把侗台—苗瑶语言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在长期奉行“汉藏侗台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引起极大震动。登上长城的时候,面对关内的农耕和关外的游牧,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世界之间思索着万里长城的历史含义,遥想华夏汉语的起

源和演变。从那以后,在研究广韵学和上古音的同时,开始阅读民族语言学论著。

1987年看到竟成先生论及古代汉语和阿尔泰语相似性的《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1988年读到格勒先生论述距今6000年前考古文化学的《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三大历史传说氏族系统、东亚—南洋三大语言系统在脑海中冥然贯通。1988年草成《试论原始华夏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初步提出“东亚三大太古语言系统说”和“原始华夏语混合说”的假说。尽管白保罗切断了汉语和澳泰语的同源关系,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统和传说氏族系统相互印证的宏观背景,推断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南方语必定具有发生学关系。1991年从《国外语言学》上看到法国学者沙加尔(L. Sagart)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论文的报道,有如门捷列夫听到新元素的发现。邢公畹先生在《民族语文》上对沙加尔的述评,使大陆语言学家了解到“汉语—南岛语同源假说”的最新论证。郑张尚芳先生提出以之囊括汉藏、南亚与南岛诸语言的“华澳语系假说”,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被包容在更大的语系之内。在沙加尔论证的影响下,中国民族语言学家和一些古音学家开始从“澳泰语系假说”的论争转向“汉藏语和南岛语同源关系”的讨论。与之同时,“汉语的祖先”这一专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的热点课题。

我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探索。十几年来,首先立足于以音韵为本而贯通文字训诂,再打通古今汉语学和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进而力图融会贯通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神话传说学、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学术思想史等相关科学。以“大视野、全方位、重探索”的宏观立场,采取语言文化史的溯源沿流、跨学科成

果的融会贯通、史实和史论互渗的研究方法,相继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1993年写成《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以“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修正了桥本万太郎的“推移”说。蒙韩国仁荷大学校中国语学科教授蔡瑛纯博士和台湾大学文学院陈贵麟博士推荐,修改后的拙文分别刊载于韩国和台北。1994年秋写成《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从大文化史角度对当前通行的四种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瑞典]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美国]普林斯顿方言逆推型模式、[美国]张琨时空二维差异型模式、[日本]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型模式)逐一加以剖析,阐述了“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理论模式。1995年写成题为《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國語》的五万字论文,力求贯通考古学、历史学、传说学、人种学、民族学与历史语言学诸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以“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为背景,将新模式概括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通过对华夏汉语溯源沿流式、大视野、全景观的审视,以期建立全新的中国语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不但以新的模式重新阐释中国语言史,而且试图通过阐释中国语言史来重建中国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1999年又完成了《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提出采集狩猎经济型语网、海上游牧经济型语珠、农耕经济型语区、游牧经济型语系的四分法,试图从世界文化背景上来阐释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语言的关系类型和演变模式。

戴昭铭教授在《文化语言学导论》^①第十三章第四节援引并且评价了“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和“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理论模式:

① 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李葆嘉提出的这个理论模式不仅对于汉语的起源以及汉语方言的现状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可以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关于语言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关系的见解。‘三元混成’理论的优长之处在于它可以促使我们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改换一种视角和方法,从而揭示出‘一元分化’理论模式的研究中被忽视、被掩盖的语言事实,并给这些语言事实以新的、更合理的解释。比如,在以往‘一元分化’模式的研究中,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汉语的统一性和汉语方言对于共同语的从属性,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缺陷……一方面南方方言中作为底层现象的古夷越语的异质特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揭示,更看不到其与南岛语系的同源性质,另一方面则是对北方方言的阿尔泰化估计不足,对其中的有些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起源也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缺陷都可望在‘三元混成’观念指导下的研究得到弥补……如果上述关于华夏汉语‘三元混成’的李氏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就是说连远古的‘汉语’也是一种混合型语言。”

第一次追溯到 7000 年前的《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曾寄呈同行赐教。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语言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光宇教授(1995 年 3 月)评价:“这是一篇宏观综论的学术论文。就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说,可谓上天入地,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就其驾驭的能力来说,可谓博观约取,剪裁适度;就作者的创造性思考来说,可谓继往开来,嘉惠学界。”

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史有为教授(1995 年 3 月)来信说:“我早年曾有志于音韵与语音史,欲向上溯源。但因工作所限不得已转而攻现代汉语。如今读来不禁想起当年理想今已有强手摘取,心中甚是欣喜。”

蒙史先生推荐,拙文忝列日本《中国语研究》首篇。又蒙史先

生与旅日同道悉心校对,在此再次一并深表谢意。

1994年7月,第三届汉语语言学国际会议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美国《中国语言学报》创刊人及主编、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研究院王士元教授主持了“汉语语源”专题研讨会。1996年夏,王先生欣然应邀来南京师范大学访问交流,亲授其学术经历和词汇扩散理论。在交谈中,后学才得知桥本是王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从而验证了拙文“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说与词汇扩散理论具有内在联系”的推断。在将有关汉语来源和汉语史研究模式的几篇拙文呈王教授赐教的同时,蒙王教授惠赠论文集《汉语的祖先》(*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nograph Series No.8, JCL, 1995)并从黄山来信。同年11月,拙著《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在台湾出版,应邀出席著作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顺访香港中文大学,飞往台北前,王教授相约启德机场见面。1996年12月,王先生惠寄翻译出版《汉语的祖先》的授权书。目前,正在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几位同好合作翻译这部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平、昭示21世纪中国语言学以及东亚—南洋语言学研究趋势的论文集,以飨大陆关心这一具有世界语言文化史价值的专题的学人。

正如一些同行专家指出:要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7000年历史长河中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也只能提出纲目;若从专论的分析着眼,《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不免粗疏。关于这一宏大论题,需要详加探讨的专题比比皆是,而拙文更多的还只是体现一种多元思路、一种理论探索、一种贯通模式。

引人深思的是,多年来的考古学研究,在中华大地上并没有发现新石器单一原始母文化,华夏汉语的单一起源论与近年来考古

文化的史前多元性相悖。在文化长河中,语言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处于“南耕北牧”生态环境中的华夏汉语不可能是一元自变型。不但新石器—金属时代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过程非常复杂,语言类型经历了从黏着转变为孤立的动态变化,而且秦汉以来汉语的推移发展,也在同化周边语言的过程中异化了本身。因此,我提出东亚大陆“汉语化”历史进程中的“同化即异化”观。

传统语言学注意到语言的地域差异,结构语言学突出语言的时间层面,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兴起的社会语言学,拉波夫(W. Labov)才对美国城市语言的社团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语言是人的语言,语言社团差异或语主差异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的时间变化是语主的世代传承差异,语言的空间变化是语主的群体迁徙差异,语言的社会变化是语主的社会身份差异。更引人注意的是语主的突然部分变换,即原先语主的部分中断。语言换用过程具有双向性:对于换用语言的民族群体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换用的语言系统来说则是语主的变更。语言结构的变化,说到底还是语主的变化。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在语言内部,而在语言外部,在于语言主体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的延展。因此我提出语言存在或演变的“时间·空间·语主的三维矢量观”。

如果要探索汉语的祖先,语料的匮乏决定了通常的语言研究方法无法“包打天下”。然而,只要人们探索汉语语源的欲望无法抑制,那么只有另辟蹊径。王士元教授在《汉语的祖先:回顾和前瞻》中,提出了对汉语的祖先的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人类学的交叉印证法和综合研究观。尽管有人囿于“纯正语言学”或“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立场,不赞成吸取非语言学方法,然而我仍然坚持:“汉语的祖先”或“华夏语的起源”不仅是一个历史语言学专题,而且是一个与“华夏民族起源”和“华夏文化起源”密不可分的“大文

化”或“文化原型”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与同大西洋文化圈相对的太平洋文化圈的起源和演变相关的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大课题。与进行田野调查的“口语语言学”和依据文献考据的“文献语言学”不同,对“语言的祖先”不可能微观描写,只能依据考古文化系统、体质类型特征、传说历史资料、历史民族迁徙等,依据现存民族语言的特征以及历史语言构拟等,大致宏观勾画语网的区划和语区的形成,只能参照现存语言中所保留的古老结构类型来大致推测远古语言特征。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石器时代的语言研究可以命名为“考古语言学”。这一研究的价值是为后来语言的演变寻找一个可以追溯的预设源头,建构一条溯源沿流、梳理支脉的宏观线索。“祖先的研究”并非需要也无从进行微观确证,非微观确证性并不是考古语言学的“专利”,就是文献语言学也在所难免。在不可能精密的地方苛求精确,无异于“画蛇添足”。模糊尚且可信,精确则难免荒谬,这正是科学主义的精确方法在人文学科领域使用不当造成的弊病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自然科学精确方法也同样有使用限度:宇宙大爆炸时间能否精确到距今的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从猿到人的演变又能否精确到何种环节?归根结底,自然发展的不可重现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注定了科学的“永恒之谜”。从以上立场来说,对使用非语言学方法来探讨史前语言面貌的任何指责都显得毫无意义。

科学不是永恒真理,科学只是一套证明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假说,科学的生命力在于永远的可证伪性。长期以来,传统语言学研究偏重于微观考据的举证而忽略了宏观模式的建立,结构主义理论更是将“现代语言学”误导入共时和历时的割裂。微观语言学研究固然是基础,但是没有宏观理论指导难免盲人摸象。尽管有人不赞成“空对空”的理论研究,但是“地对地”、“地对

空”、“空对地”、“空对空”的探索都是可行的。尽管有人坚持语言学的“纯正本体”研究,然而语言的“本体”随着视角的转移而变化,通常所认为的边缘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在创始人拉波夫看来是本体语言学。如果我们同意人类语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合,那么任何语言研究,从对象来说都是本体(并非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音、语法结构才是语言的惟一本体)研究,从方法来说难免交叉。即使标榜为“内部语言学”的索绪尔方法论,也是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学术在于创新,创新需要宽容。没有理论的材料只是一盘散沙,个别研究结论在理论体系中获得新的价值。材料的价值不在材料本身,而在于阐释材料的理论模式。既可以从材料引出理论,也可以从理论审视材料。正如完全摆脱观点的材料从未见过一样,完全脱离材料的理论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强调材料的同时不可以忘记“穷尽性”归纳是不存在的;批评演绎法的同时不可以忽视其实就是在应用演绎法。对于当代中国语言学,理论不是嫌多,而是过于短缺。在一个不习惯理论思维而善于从经验出发的国度,任何对理论研究的苛求都暗示着目光的短浅和思维的贫乏。一言以蔽之,直觉、灵感、类比、统觉、归纳、演绎、概率、演算都是认知世界的手段。中国宏观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改变“套用”西方理论框架的传统,为微观和中微观语言研究提供中国语言学家创立的新的理论模式。

因此,窃以为:“语言史是广义文化史或文明史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史就是这一民族文化史或文明史的折射与积淀。一种语言的形成演变史与这一民族的形成演变史是平行展开的。语言的史前状态是非常复杂的。语言的演变因素除了时间、地域,还有语主,还有语言接触中的渗透、交融、换用和混合等等。很难设想,一种游移于文化史之外的语史研究模式,一种建立在并不完整

的文化史观之上的语史研究模式,一种得不到考古文化研究成果支撑的语史研究模式,能满足对这种语言的起源与历史演变的深入研究。”^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掀起一股“文化热”,或试图以文化学方法来剖析传统文化,或试图以国学方法来弥合西学东渐的文化断层,或把兴趣投放到对古代神话的重新阐释,或专注于挖掘国民性以寻求对误入歧途的解脱办法。凡此种种研究,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释读。然而一些名噪一时的“宏论”,往往因为缺少扎实的文献根底而实为皮相之见。与之同时,语言学界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从横的平面上看,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学科;从纵的剖面上看,文化语言学是一种思潮。这一思潮不仅是对近百年来套用欧洲传统或语法学框架的历史性反拨,而且蕴含着在与老一辈学者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灵的躁动、命运的沉思、价值的抉择以及期待的否定。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学术拒绝权威。尽管爱因斯坦调侃“为了惩罚我蔑视权威,命运使我自己成为一个权威”,科学史和学术史还是一再证明——权威意味着窒息。文化语言学的历史价值不尽在其本身,而在于推进了中国语言学从一统到多元的历史性转折。与其他文化语言学的流派都不同,我所默默跋涉的则是另一条道路:一方面,以汉语音韵为对象从事中国文化音韵学的体系建构(难免“茕茕孑立,顾影自怜”);另一方面,采取融会贯通方法进行东亚华夏汉语史的溯源沿流,而形成“历史文化语言学”的鲜明个性。

1996年秋,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徐通锵教授进修理论语言学。他最使学生难忘的两句教导是:1. 从空间发现时

^① 李葆嘉:《高本汉直线型研究模式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间;2. 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根简单的线索。在学生看来,前者是方法论,而后者是哲学观。从事语言的宏观研究,一方面要遵循从空间发现时间的方法,以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周边语言以及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追溯华夏汉语的源流,探索华夏汉语与接触语言互动交融的演变大势;另一方面要力求从复杂的事物中发现简单的线索,建立起能够对考古学、传说学、历史学、遗传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中一系列纷繁复杂问题进行通盘解决的理论模式。“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模式,仅仅是一个斗胆的尝试。

这本著作记录了一个探索者多年来坚持精神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思考足迹。文中的观点可能大胆假设有余,难免小心求证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剔削爬罗、去粗存精。具有远见的语言学家也许赞同:只有坚持汉语语言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家和国际语言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和相关学科科学家通力合作,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方法和现代西方理论、宏观系统阐释和微观深入考证、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融会贯通,才有希望早日揭开披在原始华夏语这位美丽女神头上的神秘面纱!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1999年4月10日于古南都随园



◆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

◆ 顾 问 季羨林
袁锡圭

◆ 名誉主编 胡裕树
吕冀平

◆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晓明
李先耕
李 彤
吴国忠
邹韶华
戴昭铭

◆ 主 编 戴昭铭

